
20 世纪中国“合会”的演进：

浙江和台湾的比较分析

陈建林

【摘要】从中国“合会”的发展历程、影响力、运行方式、政策和功能五个角度出发,分析了浙江和中国台湾“合会”的演变过程,对两者的发展轨迹进行比较。这两个地区一百年来中国“合会”不同的发展轨迹为我们认识民间金融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合会; 发展演变; 民间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 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6052(2010) 05- 0069- 05

一、引言

中国“合会”是一种民间储蓄、融资和经济互助组织。王宗培认为,合会的含义是:“自其方法言之,合会为我国民间之旧式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间金融之组织也”^①。

浙江的民间资金数量庞大,尤其是温州地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扩大,从1980年的4.5亿增加到2004年的400亿左右,增长了大约88倍。尤其对温州市的民营中小企业而言,民间借贷显得非常重要,姜旭朝等(2004)指出,温州全市民营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中,来自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24%,其余的76%全部来自民间借贷。

台湾民间金融规模同样非常庞大。1964—1986年,台湾民营企业的民间借贷金额从75.24亿新台币上升到6287.74亿新台币,增长82.6倍;而从民间借贷在台湾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最高年份(1964年)高达48.11%,最低年份(1974年)也达到30.09%,平均比重为36.62%^②。

浙江和台湾都是民间金融非常发达的地区,而合会是民间金融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浙江和台湾合会的变迁历史,对浙江和台湾合会的发展演变作比较分析,从而对两个地区合会的发展脉络做出初步判断。

二、浙江合会的发展演变历程

(一) 发展历程

20世纪,浙江合会的发展有两个发展高潮阶段:一个是20世纪初,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另一个是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20世纪初,浙江合会战胜了现代银行,相对于其他传统金融手段典当和高利贷而言,也具有更强的吸纳力。20世纪30年代以

收稿日期:2010年6月25日

作者简介:陈建林,广东商学院会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广州,510320。

后,随着江南农村经济的普遍恶化,“农民经济枯穷,会的信用全失,已成者多数瓦解,筹款更难”^③。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江南地区的合会制度逐渐衰退(单强,等.2002)。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合会等民间信用转入“地下”,但并没有绝迹。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合会的发展再次焕发生机。在八九十年代,浙江温州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较快,快于正规金融机构信贷市场的扩张;90年代中后期至今,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趋缓,正规银行机构信贷支持在社会融资结构中开始上升为主体,这一时期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较为稳定。浙江合会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互助性合会,进一步发展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性合会。

(二)影响力的演变

从合会资金占借贷资金的比例来看,20世纪初浙江合会的比例比较大。20世纪30年代,浙江农民通过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所得到的贷款仅占全部贷款的10%左右,而农民37.7%的借款以合会为主^④。合会的借贷资金大约是银行借贷资金的4倍。到了80年代,各种会和其它形式的民间金融,它们在市场中的份额约12.5%。会的资金总量约214亿元,而金融机构贷款不到资金市场总量的1/3,居民存款首先考虑存到会里。

从合会的数目和家庭参与合会的比例来看,这两个阶段浙江合会在当地民众的影响力很大。1934年的调查表明,浙江的合会数是154个,占全国合会总数的8%,全国每县平均仅2.21个合会,浙江省有3.35个,这说明浙江合会非常普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合会的人也非常普遍。温州苍南县金乡镇就是典型,8000多户几乎家家都参加会。以温州市项东村的调查为例,以户为单位计算的合会参会率为82.8%(胡必亮.2004)。

(三)运行方式的演变

1. 会金得标方式根据选择收取会款的会员的法则,合会主要分为三类:按会前约定的次序轮收的称为“轮会”,以摇鹅方法确定收会的称为“摇会”,用投标方法竞争得会的称为“标会”。

1932年的调查显示,浙北有12种不同的钱会组织,其中,7种钱会采取“认”的得会方式,即“轮会”,5种钱会采取“摇”的得会方式^⑤。1934年的调查表明,浙江的摇会占到所有合会总数的45.6%,轮会占30.7%,标会为7.7%,这三种合会占到所有合会比例的80%^⑥。

改革开放以后,会金的得标方式仍以这三类为主,但是采用标会的数量增加了。一项对台州的调查表明,会金的得标方式中,标会最受欢迎,约会(即轮会)比较少。2002年温州项东村的调查也表明,合会形式基本上为单一的标会(胡必亮.2004)。

2. 合会的人数与会期

20世纪初,合会参加的人数,少者五、六人,多者十数人,甚至数十人(单强,等.2002)。1932年调查可以发现,浙北合会的规模在7人到25人之间,会期最短为4个月,最长为1年^⑦。1934年的调查表明,58%的合会年限在5年以内^⑧。

改革开放以后,合会的参加人数和会期都有小幅增加。一般来说,合会存续时间短则1年左右,长的可达到8年5个月;会员少则2人,多则上百人,有的会还有外地人。

3. 会金的数额与利率

1932年的调查显示,浙北合会的会金的金额最少为50元,最多为1000元,在12种不同的钱会组织中,4种在100元以下,6

种在 100 元到 200 元之间,还有两种在 100 到 1000 元之间。1934 年的调查表明, 58% 的合会会款在 100 元以下, 100 元~ 200 元的合会占 21. 6%, 200 元~ 400 元的合会占 8. 6%, 400 元以上的特大合会则占 11. 8%。80 年代以后, 合会的金额大幅增加, 可以满足部分生产所需的资金。温州合会按金额规模有千元会、万元会、乃至数十万元会, 以“单万会”居多。温州苍南的单个会一般在 3 万元左右, 最大的也在 5 万元以下。温州项东村的调查表明, 每个会的平均规模大约为 6000 元, 平均运行周期大约为 2 年。

合会的利息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0 世纪初, 合会利息较低, 高者月息只 1 分左右, 低者仅三四厘^⑨。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温州合会会金的月息一般为 2%~ 2. 5%。如表 1 所示, 80 年代以后, 温州的民间利率的年利率在 25%~ 45% 之间, 比官方基准利率要高。利率水平的提高可能与合会更多地满足生产需求有关。为了满足生活互助需求的合会, 其利率比较低。21 世纪初, 温州市苍南县合会的“贷款年均利率”最高为 2. 23%, 低于正式金融机构普通贷款基准年利率 (5. 31%) (冯兴元, 2004)。

表 1 温州民间利率水平表 (%)

年份	1978	1980	1983	1985	1988	1990	1995	1998
民间利率	42	34. 8	26. 4	36	45	34. 8	30	26. 4
一年期特别款种利率		12	12	12	17. 28	17. 28	14. 93	7. 56

资料来源: 史晋川,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197.

(四) 合会政策的演变

浙江合会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和规范, 对待合会的政策时松时紧, 当出现“倒会”事件后, 政策就会比较严格。

在 20 世纪初, 合会纯系私人合作, 不具有法律效力, 政府无相应法规管理, 一旦会脚因某种原因不能按期缴纳会金, 会务停止运行, 其责任只能由会首负担, 但因会首责任过重, 力量太小, 会脚亦常常遭受损失 (单强, 等, 2002)。

在法律法规上看, 现代的标会依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在经历了 80 年代相对宽松的时期以后, 随着“倒会”事件的发生, 90 年代中后期对合会的政策开始严格了。对于营业性的合会, 政府持否定的态度, 例如温州明确规定: 严厉打击以赢利为目的、以“做会”为主要形式的非法融资活动; 对于一人担任多个“会主”角色, 或专门从事组织各种“呈会”以谋取收益的人员, 要严加监管, 规模过大的“会”要坚决予以取缔^⑩。

(五) 合会功能的演变

在 20 世纪初期, 合会主要是以满足生活急需为主, 也有一部分是满足再生产需求。费孝通指出, 通常组织这种互助会的目的是为办婚筹集资金, 为偿还办丧事所欠的债务。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合会也首先是从互助性合会发展起来。但是, 有些合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间接的民间信用手段, 失去了互助的性质, 变成了营利性的私人金融组织。“标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标会”的运行规则是进行利率竞标, 谁出的利率高,

谁先得会金。在八十年代,浙江合会的民间利率在 25%~ 40%之间。史晋川等人指出, 80 年代中期以后,有小部分合会演变为诈骗性的“拍会”,会主以高利率为诱饵(有的月息高达 50%),骗取大量资金在“会”与“会”之间周转。

三、台湾合会的发展演变历程

台湾合会虽然仅是众多正式非正式金融工具中的一种,但其融通资金规模之大,普及程度之深之广,在世界上无出其右(李晓佳. 2005)。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会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理清其演变的脉络。

(一) 发展历程

裴天士(2005)将这 100 年来台湾合会的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合会是在纯粹互助的基础上组建的,其性质为互助性合会。第二阶段合会开始分成两类:非营业性合会和营业性合会。第三阶段的标志是 1913 年企业化经营的合会的出现,出现了致力于组建合会的金融公司。第四阶段的标志是 1916 年“合会储蓄公司法”的颁布,从此合会储蓄公司成为金融机构,开始正式纳入金融体系。第五阶段的标志是从 1976 年开始,合会储蓄公司从非银行机构升级为成熟的中小企业银行。这些中小企业银行在 1998 年最终成为普通民营银行一员,至此合会复归传统,以民间经营为主(李晓佳. 2005)。

(二) 影响力的演变

考察台湾合会的影响力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看合会在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即合会金额占全部金融资金的比重;二是看台湾居民参与合会的程度。

从 1964 年到 1988 年,民间合会规模占全部金融资金的比重大致在 5%~ 10%之间浮动,并保持震荡走高的趋势,从 1964 年的 6. 8%增加到 1988 年的 10. 2%,所占的比例增加了 50%^①。这表明台湾合会在企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在增大。

虽然不同学者的调查数据各有不同,但均显示台湾居民参与合会的程度非常深。对台湾地区 86 所合会中的 5670 个家庭调查显示,大约 68. 3%曾参加过某种形式的合会^②。另一项调查表明,台湾民众参与标会的普及率高达 85%,标会所占信用资金一年为 1140 亿元,占调查当年(1978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21. 92%^③。1984 年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参与这种民间金融活动,而且都市群众的参与程度还略高于农村;从家庭所得划分来看,家庭所得越高,其参与程度也越高,年收入在 60 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入会比例高达 70%^④。从 1977 年到 1991 年,台湾合会家庭参与率呈现“增长—下降—增长”的趋势,从 1977 年的 24%增加到 1979 年的 31%,1980 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倒会风波导致合会家庭参与率有明显下降,到 1985 年下降到 5%,然后合会家庭参与率重新上升,到了 1991 年回升到 23%^⑤。

(三) 运行方式的演变

1. 会金得标方式

会金得标方式呈现了“抽签—竞标—抽签”的演变。在单纯互助性合会,主要采用抽签等方式预先制定得标的顺序。当营业性合会出现以后,主要通过秘密竞标的方式确定得标会员的顺序,出标金额最高者得标。自 1956 年起,台北区合会储蓄公司开始

使用抽签的方式,其它公司亦仿效推行;到1964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合会公司所经营的合会还是在运用投票方式,10年以后,这一比例降到了3.7%。在1967年底,各合会储蓄公司的抽签式合会契约金额已达74.19亿元(新台币),占契约总金额的76.5%。

2. 合会的人数与周期

合会的人数与周期的演变情况难以找到全面的资料来分析,但是从一些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其特点。1922年,中国业主组织的合会多达4400个,每个合会平均召集12名会员,而日本业主共注册了1070家合会,每个合会平均召集25名会员;到了20世纪40年代,无尽公司经营的合会平均召集30名会员。不同合会开标频度和持续期限也不尽相同,最常见的为每月开标一次,但也有半月、每旬甚至日日开标者。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发现,最常见的是18个月和20个月的合会契约,占全部契约的85%以上。

3. 会金的数额与利率

在日本殖民时期,从1916年到1942年,会费总额增长了20倍,会金总额增长了5倍。光复以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约三分之二的会金平均在10000新台币左右(合当时250美元),这相当于当时每人平均国民所得的三分之二。

从利率来看,学者的调查表明台湾合会利率是银行利率的两倍水平左右。李晓佳(2005)运用《金融统计月报》的资料,推断1964—1994年台湾合会利率是银行利率的两倍水平,民间合会利率保持在年息20%~30%之间。有学者则估算,1982年民间合会利率约为年利率20.27%,接近同期银行短期放款的利率的2倍^⑧。

(四) 合会政策的演变

从最初的日本殖民政府,到后来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合会”都制定了相同的管理策略:规范管理,个别取缔,允许专业金融机构吸收容纳。

1902年专门针对互助性合会公布《讲会取缔规则》,规定会首必须订立一份会书,并在指定部门进行登记。1913年,将日本的《无尽业法》引入台湾,规定合会业务的经营须采取企业形式。1922年,放宽注册管理,即会员人数不超过20人、会期少于2年、会费不超过15日元时,合会不需注册^⑨。台湾光复后,政府对合会仍是网开一面。台湾1948年颁布《台湾合会储蓄业管理条例》,建设合会储蓄公司体系,允许合会公司进行票据贴现、境内外汇业务、无担保贷款;1976年决定将合会公司转型为中小企业银行。在1999年由“立法院”通过了《民法债编》,首次以法律形式对民间合会的定义、契约条款、竞标程序、会首会员责任义务等做出了详尽规范(李晓佳,2005)。

(五) 合会的功能的演变

与浙江合会类似,台湾合会同样首先是互助性合会,一部分发展为营业性合会,甚至有一小部分发展为诈骗性合会,出现倒会的风波。尤其是在20世纪末,倒会风波从台湾南部的美浓镇、彰化县以及桃园县一直蔓延到台北的三重市^⑩。但是,不少合会在政策引导下,其运作逐渐纳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中,其功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逐步增加了银行的功能。首先,可以为入会者提供小规模的金融服务,如办理贷款和存款账户,公司从中收取服务费。其次,《台湾地区合会储蓄业管理规则》公布后,其服务范围得到扩展,非参与合会者可以向合会公司借款,允许合会公司进行票据贴现、境内外汇业务、无担保贷款。

四、浙江与台湾合会演变历程之比较

作为民间金融发达的地区,浙江和台湾合会对当地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比较浙江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会的发展历程,本文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 从发展历程来看,浙江合会转入地下,台湾合会浮出水面

从浙江合会的发展轨迹来看,20世纪初,合会在浙江处于地下状态。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合会呈现“地下-半公开-地下”的趋势。从最初的各种互助性质的“会”,到“半合法”的营利性的“会”和私人钱庄,但是90年代以后,这些“准合法”的金融中介被清理整顿,被迫转入地下状态。从台湾合会的发展轨迹来看,台湾合会呈现“地下-半公开-公开”的趋势(胡军、陈建林,2008)。台湾的合会组织经过开办合会金融公司、纳入金融体系、将合会公司组成中小企业银行三个阶段,将合会完全公开化。

2. 从影响力来看,两个地区的合会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合会的数据不具有公开性,现有文献的调查数据不完全相同。然而,就现有的数据而言,无论是浙江还是台湾合会均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从合会金额占全部金融资金比重以及居民参与合会程度这两个指标来看,都体现了合会在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

3. 从运行方式来看,两个地区的合会各有特点

首先,就得标方式而言,浙江由以轮会、摇会为主转变为以标会为主,台湾则呈现了“摇会-标会-摇会”的发展轨迹。其次,就合会的人数与会期而言,浙江合会参与的人数在增加,会期的时间也在延长,台湾合会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最后,从会金的数额和利率来看,浙江会金的数额的平均值高于台湾,而浙江合会会金的利率也高于台湾合会。

4. 合会政策取向相异:“推式”与“拉式”

浙江和台湾对待合会的政策取向并不一致。浙江采取的是“推式”,希望用合法的金融组织替代民间金融组织。浙江在20世纪80年代对合会等民间金融组织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但是90年代以后,这种态度开始发生转变。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将城市信用社合并成商业银行,并整顿了私人钱庄、农村基金会等,对合会进行了治理。由于这种推力,合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开始转入地下。

台湾采取的是“拉式”,将地下民间金融组织引导成公开民间金融组织。台湾对待合会的基本策略是:严格规范,个别取缔,允许专业金融机构吸收容纳。合会行为的银行化,意味着对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方式转变的支持。这一金融领域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对旧有融资方式的抛弃,而是意味着现代金融机构对这些融资方式的接纳。

5. 从合会功能来看,两个地区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从合会功能的演变趋势来看,浙江和台湾合会的相似之处有两点。第一,无论是浙江还是台湾的合会,均有互助性质转变为营利性质。两个地区合会最初的目的均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生活中或者生产资金缺乏的困难,实现互相帮助的目的,但是后期合会都具有营利性质。第二,合会的功能均出现了异化的现象,两个地区合会的发展都出现过失控的现象,发生了“倒会”风波。浙江和台湾合会功能的不同之处体现为:台湾合会的运作逐渐纳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中,因此增加了银行的一些功能,而浙江合会不具有银行的功能。

注释:

-
- ①王宗培. 中国之合会. 中国合作出版社, 1935 年版: 1.
- ②黄家骅, 谢瑞巧. 台湾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演变. 财贸经济, 2003 (3): 91— 94.
- ③冯和法.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上海黎明书局, 1935 年版: 318, 429.
- ④调查数据来源于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 农情报告, 1934 年 (2 卷 11 期).
- ⑤调查数据来源于韩德章. 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 社会科学杂志, 1932 年 (3 卷 2 期).
- ⑥调查数据来源于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 农情报告, 1934 年 (2 卷 11 期).
- ⑦调查数据来源于韩德章. 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 社会科学杂志, 1932 年 (3 卷 2 期).
- ⑧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年鉴 E. 1935 年版: 181— 182.
- ⑨王宗培. 中国之合会. 中国合作出版社, 1935 年版: 367.
- ⑩参看温州市 2005 年 8 月 2 日颁布的《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
- ⑪林钟雄. 防制地下金融活动问题之研究. 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报告, 1991 年版: 66— 67.
- ⑫陈美伶, 陈丽秋. 台湾地区民间合会现状之研究. 台“法务部”(民国)73 年度研究发展项目研究报告, 1984 年 12 月.
- ⑬黄永仁, 杨金龙. 台湾地下金融问题. 台湾货币与金融论文集,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5 年版: 63.
- ⑭陈介玄. 货币网络与生活结构.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9 年版: 197.
- ⑮ Leven son. The Role of Informal Finance in Household Capital Accumulation : Evidence from Taiwan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6 (1): 39~ 59.
- ⑯数据来源于许嘉栋. 银行信用配给之效率与双元性金融体系资金之供需——台湾之实证研究. 中华经济研究院经济专论 (37), 1983 年 9 月.
- ⑰陈荣富. 台湾之合会事业. 台湾银行期刊, 1953 (5 卷 4 期): 123— 124.
- ⑱邹愚. 银监会调研沿海“合会”民间金融出路求解. 21 世纪经济报, 2004 年 6 月 30 日.